达菲诗歌中的暴力记忆与女性身份[1]

周 洁

© 2017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1），62–67 页

内容提要：英国当代桂冠诗人卡罗尔·安·达菲以戏剧独白诗的形式创造了许多关于暴力记忆的诗歌，女性在暴力行为中身份各异。她们有时是在暴力下沉默不语的弱女子，有时是在死后诉说暴力的女冤魂，有时是参与暴力的坏女人，有时则成为以暴力颠覆男权的女英雄。通过这些女性对暴力行为的戏剧独白，诗人揭露、批判、颠覆了男性霸权。

关键词：达菲诗歌 暴力记忆 女性身份 男性霸权 颠覆

卡罗尔·安·达菲（1955-）是2009年受封的英国桂冠诗人，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桂冠诗人，还是21世纪英国第一位桂冠诗人。她自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诗歌创作，到20世纪80年代，已在英国诗歌界颇有影响，先后获得英国国内各类重要诗歌创作奖项，赢得了广大读者。她使用日常语言形式，通过戏剧独白诗给予各类社会边缘人群以言说的机会，揭露并探讨性别、种族、殖民、虐童、移民等社会现象及问题。[2] 在达菲关于暴力记忆的戏剧独白诗中，有一些身份各异的女性形象，她们诉说了女性受暴或施暴的经历，揭露并颠覆了男性霸权。

一、 男性暴力下沉默的弱女子

由于长期处于男性霸权的控制之下，有些女性在男性暴力下沉默不语。西苏（Cixous）曾经提醒读者注意区分“speaking”和“talking”的区别，认为女性的武器是语言，她们不停地说(talk)，但是她们没有真正地说（speak）——由于没有话语权，她们无“话”可说，只是能够发出声音而已。因为无知，她们总是占据沉默的位置。[3] 女性主义认为男权是女性受压迫、受歧视的根源。女性一直与她们的压迫者——男性生活在一起：由于男权意识的强大影响，她们被看作是“他者”，或者“第二性”。作为具有女性主义思想的诗人，达菲在早期诗歌中表达了同样的女性主义思想，如诗歌《女孩儿说》（“Girl Talking”）和《精神失常》（“Psychopath”）中都刻画了在暴力下沉默不语的女性形象。

戏剧独白诗《女孩儿说》出自诗集《站立的裸女》（*Standing Female Nude*, 1985），由一位受暴女孩儿泰斯琳（Tasleen）的表妹做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了一场性暴力的记忆。叙述者讲述泰斯琳痛苦死去的过程中丝毫不动声色，甚至于说出“并不痛”（4）[4]。尽管叙述者描述了泰斯琳在荡秋千时恶心流血的情景，她却意识不到死者痛苦的原因与后果。死者的妈妈同样没有意识到，只以为女儿是胃疼（14）。直到泰斯琳死掉，妈妈才哭起来。最令人震惊的是神职人员对她的死因的解释，“她正午外出，被鬼取走了心”（22），一句话把她的死去归因于她自己的行为不轨。由此可见，女人是受男人控制的，泰斯琳遭受磨坊主性暴力致死，她们对真相一无所知，牧师还警告所有年轻女子正午不准外出，借以掩盖男人的淫乱行为。这首诗含蓄地批驳了以牧师之口说出的

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达菲诗歌女性主义研究》阶段性成果。
2 Deryn Rees-Jones, *Carol Ann Duffy*, Plymouth: Northcote House, 1999, p.1.
3 刘岩、邱小经、詹俊峰，《女性身份研究读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2页。
4 Carol Ann Duffy, *Standing Female Nude*, London: Anvil, 1985. 文中引用诗行皆由笔者翻译，括号内为诗行数。

正文.indd 62 17-12-14 下午4:49

男性霸权的谎言，牧师为了进一步控制女性，荒唐地以女孩儿正午外出作为死因以便掩盖男性的性暴力。[1] 在这首诗里，女人确实如西苏所说的，会发出声音（utter），但是她们不说话[2]：失去女儿的妈妈只是哭，没有丝毫的自我防护意识，她们不知道磨坊主丧失了人性，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受暴者，更不知道牧师的话是谎言。作为女性，她们不仅仅接受了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且把那些价值标准内化成她们的行为标准，甚至成了男性的联盟，把那些价值标准施加在下一代女性身上。所以，她们即使在遭受暴力、失去生命时仍然沉默不语。

出自《出卖迈哈顿》（*Selling Manhattan*, 1987）[3] 中的戏剧独白诗《精神失常》里，同样有一位在男性暴力下丧失性命的女性形象。由于这首诗的叙述者是男性施暴人，女性虽然拒绝了叙述者，却始终沉默不语。施暴人对自己施暴过程的记忆和描述，真实揭露了男性霸权思想及其对女性的伤害。叙述者讲述了自己童年的一些记忆片段，以及他如何强奸并杀死女孩儿然后把她丢到了运河里。叙述者是一个痴迷于自己外表、靠眼睛吸引女孩儿的自大的青年，有漂亮的女孩儿在身边时，他感觉自己像个国王，怀着一种能够控制世界的自信，似乎在他心目中，女人可以提高他的身份。他对女孩儿从他身边骑马而过的叙述似乎暗指由美女海伦引发的特洛伊木马之战，把女孩儿刻画成了一种挑战。他相信男人可以拿小金鱼和椰果讨得女孩儿的欢心，像许多电影中的故事那样，他把女性看成是男性可以通过廉价物品换来的东西。他以为自己知道女人想要什么，并以此追求他认识的女孩儿。但是，他对女性的了解只是他12岁时与爱丽丝的性经历和他碰巧看到的母亲与房客性交而父亲从中得利的情景。他对女孩儿进行诱骗，但是，遭到了女孩儿的拒绝，为此他很生气，因为他自负地认为自己比猫王长相好，有潜力。气愤之极，他杀了女孩儿的金鱼，还残忍地用拳头打掉了女孩儿的牙齿。整首诗中，他几次重复说她在运河里，好像是在暗示女孩儿是在地下或者地狱。在诗歌最后几行的独白中，凶手似乎没有丝毫悔恨。他把角落里的女孩儿描述成“露丝·爱丽丝的替身/轻酌着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杯金青柠”（59-60）。露丝·爱丽丝是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处以绞刑的女人，因在伦敦的一个酒吧外杀害了对她很凶残的情人而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凶手把女孩儿说成是露丝·爱丽丝的替身，与后面酒吧间的男招待说到了关门的时间，似乎在预示她生命的结束。精神变态的凶手说“在我的头脑里/有一种奇怪的冷静，我几乎能飞”（61-62），似乎他离开了那个地方就能够忘记他的罪行，对他来说，“明天/我就到了别处，忘却了一切”（63-64）。很明显，从他的叙述来看，他实际上无法忘记事情的整个过程。他独白最后的几句话毫无意义，实际上，他又回到了精神变态的迷幻状态。该诗不仅表明凶手的精神变态，更明确地告诉我们，男人把女性看做“物品”，认为女人应该服从男人。这种男性霸权思想使这个青年使用暴力杀死了拒绝他的女孩儿。

但是，女性在受暴后会永远沉默吗？女性想要获得解放，必须推翻男权体制，为此，女性主义质疑男权性别体制的合法性，挑战男性在人类社会的至上地位[4]。在《精神失常》最后一节，凶手提到的露丝·爱丽丝既是男性暴力的受害者，也是女性主义的偶像。虽然，精神失常者杀死的女孩儿被剥夺了生命，并且一直沉默不语，诗人却似乎为其后来诗歌中创作的女性施暴者形象埋下了伏笔。

二、诉说政治暴力创伤的女冤魂

很明显，达菲不能忍受女性受暴后的沉默。即使她们死了变成冤魂，也要诉说暴力给她们带来的创伤。在出自诗集《站立的裸女》的反战诗

1 Angelic Michelis & Antony Rowland eds., *The Poetry of Carol Ann Duffy: Choosing Tough Word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1.

2 刘岩、邱小经、詹俊峰，《女性身份研究读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2页。

3 Carol Ann Duffy, *Selling Manhattan*, London: Anvil, 1987.

4 参见 *Carol Ann Duffy* Interview at http://www.telegraph.

正文.indd 63 17-12-14 下午4:49

歌《流星》（“Shooting Star”）中，达菲以一个在二战期间死于纳粹大屠杀的犹太妇女作为叙述者，从坟墓和记忆中诉说了纳粹的残暴和受暴者的悲惨遭遇，使这段记忆永远留在人类历史上。

诗歌首先揭露了纳粹的贪婪和残酷。叙述者在诗歌开头描述了纳粹因贪婪而掠夺财物并伤害无辜的情景：本来是永久爱情信物的戒指，在纳粹眼里只是财宝，他们为了得到一枚戒指而折断人们的手指（1-2）；叙述者提及了多个女孩儿的名字，她们都无助地成了纳粹残暴的遇难者（3-4）。很明显，纳粹分子准备射杀她们。在这里，诗人通过“星星”的比喻，表明犹太人脸上的印记代表他们的出身。这种标记既是他们个人身份的印记，也是他们遭受纳粹分子虐待、被剥夺自尊和生命的印记。叙述者为这些女孩儿表示悲哀，因为她们失去了生命；但她也为她们自豪，因为她们勇敢地站立着，像雕塑一样（5）；除此之外，她只能回忆，那些日子让世界变得永远低劣（7-8），似乎她是个先知，可以预见那悲惨的情景，并把它留在人类的记忆里。

诗歌还通过叙述者对自己遭受性暴力的回忆揭露纳粹的残暴。在这里，诗人用语委婉，“一个士兵见我活着，解开了/他的腰带”（8-9），谈及自己被强奸的后果，她说“我的肚肠惊恐破裂”（9），揭露了纳粹对犹太妇女所犯下的令人难以启齿的罪行。纳粹曾经制订政策为30万犹太人施行绝育手术，他们却又强奸犹太妇女以表示他们对犹太民族的统治。对女人的这种伤害代表纳粹对犹太民族的毁灭，这种暴力不是单纯的性暴力，还是一种政治暴力，因为女性与一个民族紧密相连。[1]

诗歌试图唤起人们对纳粹的残暴与战争给女性带来的创伤的回忆。叙述者看到死尸中的孩子时，纳粹士兵大笑着朝孩子的眼睛射击（11-12），这对犹太女人是一种折磨，让她至今记忆犹新。不幸发生得出人意料：在一个美妙的四月的晚上，年轻人正在坟墓旁吸烟交谈（14），她突然听到枪声，孩子没死，士兵只是在开玩笑——对犹太人的生命开玩笑对于纳粹士兵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他们对生命没有任何尊重。大屠杀后，生活中充满巨大的痛苦（17）和可怕的呻吟（18）；人们继续生活着：在草地上喝茶、洗制服、孩子跑向玩具，世界在沉睡中将死者埋葬（19-20）。让叙述者不安的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人们很快便把一切忘记，他们仍然互相残杀。她呼吁人们不要忘记她所遭受的痛苦，告诉那些忘记过去的人们她曾经经受的一切是无法忍受的，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会哭泣（23）。最后，她希望人们怜悯她、怜悯那些在战争中遭受痛苦的人们，因为她们凄凉而失落。

这首诗通过死去的犹太女人之口，以政治暴力的受害者身份，用近乎宗教仪式中使用的语言讲述过去与现在，呼吁人们以过去的记忆为镜，停止掠夺、停止暴力，给世界以和平，给社会以和谐。

三、男性影响下施暴的坏女人

女性被男人看作客体的存在，被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天真、无邪、无私、忘我的“天使”，和复杂、自私、危险的“妖魔”。达菲不仅通过冤魂让女性诉说自己的受暴经历，也刻画了在男性暴力影响下参与施暴的坏女人形象。但是，坏女人是男性暴力的毁灭性影响的产物，由于男性暴力的影响，她们产生了攻击性，变得残忍，走向自我毁灭。《世界之妻》（*The World's Wife*, 1999）中的《魔鬼之妻》（“The Devil's Wife”）便描述了一个因受男性暴力影响而参与施暴并走向毁灭的女性。

《魔鬼之妻》是基于1965年发生在英国的沼泽谋杀案（“the Moors Murders”）而作的[2]。1963年7月到1965年10月间在曼切斯特及周边沼泽地区，五名10岁到17岁的孩子先后遭到奸杀。这个事件的女主角叫米拉·韩德丽（Myra Hindley），她从

1 梁晓冬，一个犹太亡灵的诉求——评英国桂冠诗人卡罗尔·安·达菲的反战诗“流星”，《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6期，第72页。

2 维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F%88%E6%8B%89%C2%B7%E5%B8%8C%E5%BE%B7%E8%8E%89

正文.indd 64 17-12-14 下午4:49

小常被父母打骂，五岁被送去与祖母同住，又遭暴力对待。由于父亲个性粗暴，她长大后便有性虐待狂心理。同犯伊恩·布雷迪（Ian Brady）则是一个出生前便死了父亲、由未婚女招待所生的男孩儿。因年轻的母亲经济拮据，他被送到当地一户有四个孩子的夫妇家收养，从小就喜欢折磨小动物，后来粗暴到伤害小孩子，曾两次因入宅行窃被传到少年法庭；工作后又曾九次被传上法庭；18岁前，曾两次被判处两年的训改（“training”）。1957年到1959年之间，他改邪归正了，但是，随后却与米拉·韩德丽犯下了沼泽谋杀案。

达菲在诗中将上述事件改写成五部分，记录女性因做了魔鬼之妻而变得残忍，最终自我毁灭的过程。叙述者在第一部分“泥土”（“Dirt”）中，讲述了自己如何与魔鬼相恋并且迷失自我的记忆。从叙述中可以看出，她是被男人迷惑后成为悲剧人物的。她被他看女孩儿的眼神、说话时的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和他的粗鲁所吸引，对他充满了渴望（1: 6）[1]，变得喜怒无常，直至他请她出去。身体的欢愉使她疯狂地迷失，放弃了工作，每天跟魔鬼去树林、操场或者游乐场，去掩埋玩偶，不分昼夜，不顾风雨。她失去了自由，一步步陷入他的控制。她感觉自己的舌头像石头；嘴像遭到重击的伤口，无法说话；眼睛像两块黑板，看不到东西。她认识到，自己对孩子没有柔情，没有丝毫的关心，似乎这些都预示着他们将要做的事情——杀死孩子。总之，第一部分就让读者看到，女人盲目地投入男人的怀抱，从此被男人所控制。

叙述者在第二部分用美杜莎（“Medusa”）做标题表现女人对魔鬼丈夫的恐惧、依恋、盲目追随和被男权完全控制的记忆。美杜莎的神话故事是女性主义者在进行女性主义理论创作中常用的：西苏在短文《美杜莎的笑》（“The Laugh of Medusa”）中，把女人看成是一个“黑洞”（“black hole, as abyss”）[2]，这个观点让人联想到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没有阴茎只有一个可怕的洞的观点，弗洛伊德把美杜莎的故事看成是对阉割的恐惧（“part of the fear of castration”）[3]。叙述者去找他们一起埋葬了的玩偶，却没找到，便产生了失却自我的意识（2: 2），也就是说，一切都发生得如此之快，好像她未加思索就被占有了，被魔鬼占有就意味着堕落。等她明白后，发现自己已经被自己的铲子和泥土埋葬了，或者说，她在埋葬玩偶的同时失去了自我。随后她发现周围没人喜欢她，她的心被紧紧地攥在他的拳头里并且被挤压成干，失去了个人意志。当人们给她照相时，她就给他们以“美杜莎的笑”（2: 7），表现得毫无生气，因为她已经变得极其冷漠，对任何事情都不在乎，包括法官、法庭甚至法律。她承认自己的堕落，被锁上了“双重枷锁”（2: 9）。她每天用他们的密码给他写信，希望能够出狱。但是，她知道这很困难，所以无望地叹息：“魔鬼是邪恶的，而我是魔鬼之妻/这就更糟了”（2: 14-5）。这叹息背后的深刻含义是她将得到更严重的惩罚，因为她是个女人——这是对男权制度的不公的揭露，在男权制度下，女人犯下与丈夫同样或更小的罪行，也要受到更大的惩罚——她所能做的只有在地窖里哀号。

叙述者在第三部分《圣经》（“Bible”）中表现出一种混乱，在拒绝承认罪行时，她语无伦次：“不是我我没干我不能我不愿”（3: 1），“不公平不对不是真的/不是那样的”（3: 9）；她对什么都不能确定，说“也许这也许那不知道说不准好像是”（3: 11），要见律师、牧师或媒体（3: 6），重复着“是他”“是他”（3: 4，12）。呼应了警方比德（Peter Topping）提到过的沼泽谋杀案罪犯在教堂里的忏悔，承认她卷入了连环案，却又说自己不在案发现场。叙述者在第四部分中用“黑夜”（“Night”）描述被判终生监禁的狱中生活，表现了悔恨和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性之后的恐惧。在最后一部分“请求”（“Appeal”）中，叙述者列出了如果没有取消极刑他们可能承受的各种死刑，

1 Carol Ann Duffy, *The World's Wife*. London: Picador, 1999.

2 See Helene Cixous, “The Laugh of the Medusa” http://bfsutheory.blog.163.com/blog/static/32293683200791452344984/

3 参见张在新转载博文（Professor Mary Klages's home page in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http://bfsutheory.blog.163.com/blog/static/32293683200791452344984/

WATERMARK

正文.indd 65　17-12-14 下午4:49

把生与死联系了起来。但是，最后，她又一次提出问题："我是魔鬼的妻子，/我能做什么？"（5: 11-12），表明身为人妻，女人无力摆脱丈夫的控制或影响。

这样看来，整首诗歌描述了一个被魔鬼吸引后误入歧途，最后失去自我受到惩罚的女人，表明男权制度下男性暴力和霸权对女人的恶劣影响及毁灭性后果。女性是软弱的，无知的，低于男性的，屈从于父亲或丈夫乃至整个男权制度；而充满男子气的男人们，无论在家还是在社会上，都是绝对的统治者，大男子主义思想在他们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中根深蒂固，也影响着女性，毁灭着女性，使她们成为男性暴力和霸权的受害者。

四、以暴力颠覆男权的女英雄

因受到男性暴力和霸权的影响而变成施暴者的女性受到了惩罚，而面对男性霸权以暴制暴、颠覆男权的女性却得到了幸福和成功。达菲在《世界之妻》的开篇之作《小红帽》（"Little Red Cap"）中刻画的小红帽便是这样的典型。自从小红帽的故事在世间流传，便出现了多个版本。在那些版本里，小红帽都是被动的角色，常常被狼吃掉后被猎人或伐木工人从狼口里救出。西苏曾在她的文章"阉割还是斩首"（"Castration or Decapitation?"）里，把女性的生存状态描述成为从一张床上到另外一张床上，从一个梦到另外一个梦，认为，即便女性像小红帽一样站起来，走出家门，仍然不能应对灾祸：她从一个房子到了另外一个房子，从母亲家到了外婆家，而外婆则是邪恶的，因为她不让小红帽外出。外婆常常是大灰狼，所有想出去探索世界奥秘的小女孩儿都受到大灰狼的威胁。为此，在西苏看来，小红帽的故事表现了女性相对于男性的被动。[1] 只有达菲在对《小红帽》的改写中，不仅改变了小红帽被叙述的身份，让她成为自己故事的叙述者，还把她描写成为以暴力杀死狼、颠覆男性霸权的女英雄，彻底改写了小红帽在人们心中的记忆。

达菲对男性霸权的颠覆首先表现在不选用第三人称叙述角度，而是让小红帽做自己故事的叙述者。由于使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角度，"我"显得非常突出，是"我"先看到狼的，从此"他"便成为"我"关注的对象——站着、读诗、长着大耳朵、大眼睛、大牙齿和毛茸茸的爪子，说话拖着长腔，红酒粘在他满是胡子的下巴上。"我"告诉读者自己追随"他"的原因是诗歌。在该诗中，狼代表一个看似成熟、自我为中心的诗人。他给"我"买了一杯酒，那是"我"第一次喝酒，天真单纯，16岁，涉世未深，但是为了诗歌，虽然知道狼会把"我"带到深深的树林里，"我"还是跟着他去到了一个充满荆棘的地方，在猫头鹰的眼睛注视下，"我"失去了童真。当然，失去童真是因为"我"主动爬向狼，并且从早到晚地依附于他的毛皮。红色上衣的碎片、耳边狼的呼吸声、听他读的情诗，勾勒出一个充满性欲的场面。失去童真后，"我"得到了知识。但是，"我"也发现了他的本性——"我"寻找白鸽时，他张开大嘴，一口便使白鸽一命呜呼。这是一只代表女诗人诗歌语言天赋和灵感的白鸽，被代表男性的狼无情地据为己有。以后与他一起的日子里，"我"吞噬着他的书，收获着成长，写出了可以与他的作品媲美的诗歌。十年过去了，"我"发现与他在一起将使"我"失去对自己天赋的拥有，终于勇敢地对"狼"采取了暴力行动：

> 我举起斧头
>
> 砍向柳树，看她如何哭泣。我举起斧头，砍向鲑鱼
>
> 看她如何跳起。我举起斧头，砍向狼
>
> 他正睡着，一斧下去，从阴囊到喉咙，看到
>
> 祖母闪光的、洁白的骨头。
>
> 我把他肚子里填满石头。给他缝合起。(36-40)

1 刘岩、邱小经、詹俊峰，《女性身份研究读本》，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5页。

正文.indd 66 17-12-14 下午4:49

在这五行诗里，达菲使用了三个排比句式，表现了小红帽的行动对男性霸权的颠覆，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诗歌末尾，小红帽变得独立而强大，不再是传统小红帽故事里那个需要伐木者或猎手保护的小女孩儿。她拿起斧头的行为表现了她拥有了继承传统的权力，更表现了她自身的活力和天资。[1] 诗歌最后几行使用的一般现在时，与开始使用的一般过去时形成对照，好像告诉读者，小红帽最初关于狼的认识是错误的，狼并不那么有才智，相反，他吃掉了外婆——男性霸权导致了女性在文学史上的沉默。小红帽看到了外婆，明白了也终止了这种沉默，她创作出生动的、鲜活的、温暖的、跳动的、长着翅膀的、狂热的文字，是音乐，也是热血（29-30），直至她最后唱着歌独自从树林里出来，都是一种宣言：她将成为一个诗人，成为俄耳甫斯（Orpheus），获得解放[2]，变得自主而成熟，从而确立女性在文学界的地位。

结语

达菲通过戏剧独白诗描述了性暴力、政治暴力、暴力犯罪与凶杀等各种暴力记忆及女性在这些暴力记忆中的不同身份。如果说在男性暴力下沉默不语的弱女子、死后诉说政治暴力的女冤魂和受男性暴力影响参与暴力的坏女人，都是男性霸权的揭露者和批评者，那么，以暴力颠覆男权的小红帽，则是男性霸权的颠覆者。这些诗歌作品与达菲的其他作品一同体现了她早期的女性主义思想，是提高女性意识，探索女性身份，抵制男性霸权的有力武器。揭露导致女性受压迫根源的男权制度，是达菲完成的一项女性主义任务，分析和审视女性作为男性暴力的受害者和颠覆男权的施暴者等身份，有助于把女性从隶属于男性的地位中解放出来，也有利于理解达菲后来在创作中表现出的对男女和谐关系的向往。

（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

WATERMARK

1 Avril Horner, “Small Female Skull”: patriarchy and philosophy in the poetry of Carol Ann Duffy, Angelic Michelis & Antony Rowland, eds., *The Poetry of Carol Ann Duffy: Choosing Tough Word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10.

2 Ibid, p.110.

正文.indd 67　17-12-14 下午4:49